

第一章 绪论

交际是一种需要两人以上共同努力的社会活动。如果讲话只是产生一系列的句子，即使是一些完美无缺的句子，这种讲话本身还不足以构成交际。只有当言语行为引起了某种反应，我们才可以说这是一种交际行为。要参与语言交流的活动，要实实在在地进行会话，仅仅具有关于句子的知识是不够用的。人并不是对所听的声音都本能地做出回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收到千千万万的信号，多到不可能对这些信号一一做出反应。在决定是否参加一次互动活动之前，我们得推测一下，或至少大致猜测一下，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活动，以及活动中我们需要做什么。以会话为例，我们得知道这次会话只是一次闲谈呢，还是一次要解决什么问题的认真谈话。这样，会话才有可能达到它的效果。一旦进入会话，讲话人和听话人都要积极地对会话进展做出反应，以表示他们还在参与会话，或者用言辞表示，或者以身姿、表情等非语言信号来表示。而且，会话反应应该是针对交谈者的会话意图的反应，而不仅仅是针对话语的表面意思的反应。

下面是一段在一间办公室中录下来的对话，我们把它

作为一个会话的例子来进行分析。

(1) A: Are you gonna be here for ten minutes?

B: Go ahead and take your break. Take longer if you want to.

A: I'll just be outside on the porch. Call me if you need me.

B: O. K. . don't worry.

译文：甲：你会在这儿呆十分钟吗？

乙：你去休息吧。想多休就多休一会儿。

甲：我就在走廊里。有事儿的话叫我一声。

乙：好，放心吧。

这段对话是典型的工作日中无数司空见惯的交谈中的一次，一般不会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整段会话流畅无阻，双方说话时似乎都不假思索。但是，如果我们要深究一下为什么这一段谈话构成了正常的、有效的交际，就不能只看话语的字面意思了。这些话语中的词汇意义、语法形式、以至单个的句子，都不能表示出句子之间的意义关联，也表现不出该会话的整体意义。

讲话人甲开始会话，使用了一个语法上的疑问句。但是讲话人乙对甲的回答并不是对甲的问句的内容给予是或否的回答，而是一个有关其他内容的提议。这一问一答之所以被认为是有关联的，是因为我们认为乙的建议隐含着一个对甲的问句的一个肯定性的回答，或者说，乙的建议间接地回答了甲的问句。这样分析甲乙问答的话语又进一步引起了为什么会话人能够超越话语表面内容而彼此理解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会话人理解和处理间接信息的能力的

问题。要理解这些有关信息，首先需要知道这一交际事件是发生在办公室里，而且交际双方明了在这种场合与他们有关的常规活动。既然没有明显的语言方面的提示，我们可以假设，交际双方在会话时都在利用这些有关环境和常规活动的共有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1）甲乙是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的同事，（2）工作时间办公室人员可以在不影响工作的条件下离开办公室进行短暂的休息；（3）同事之间一般要互相照应以保证办公室总是有人。所以，由于乙具有这些背景知识，所以当听到甲的问题时，就理解为甲想离开办公室一会儿，问她是否会在那儿呆十分钟是怕她也正巧想要离开。甲的下一段话语证实了乙的理解是对的，甲确实想出去呆一会儿。因此，乙最后一段话要甲放心就是说她会在甲离开时帮她照应一下。上面的例子说明会话人依据有关特定场合的背景知识，人际关系的知识，以及互动目的的知识来推理，获得间接信息，使会话得以进行。

笔者确信，对于会话来说，理解是参与的前提。在本书中，我们将要一一列举提出上述命题的原因。因此，有关言谈策略的普通理论首先必须指出那些会话参与者所共有的语言、社会、文化知识，然后再解释那些导致文化、亚文化，以及环境限制的特殊释义的会话推理能力。

会话分析是近十年来不断发展的领域，几个不同的学科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多年来语言学家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鉴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一直希望找到研究人类行为的更好方法，希望能够深入了解人类社会合作过程中语言信号的功能。语言学的形式语法虽然在澄清人在词句解码的认知过程方面不断取得成功，但是现存的语法理论也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许多语言学家开始寻找研究会话过程的新途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开

始注重分析人类的学习过程，社会合作，以及社会进化过程中必然包括的人与人的交际过程。

上述思想指导下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和新的分析方法以及理论视角，这些最终都会被纳入语用学的普通理论之中。这里我们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会话分析领域的发展状况。人类语言学家采用民族志的描写方法广泛调查言语活动，总结出他们称之为“讲话规则”的规律性。他们的研究表明，语言的使用情况，言语事件的定义，以及不同的言语事件的正常标准都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以及不同的社会场合而出现变异。有关语言使用的调查结果在非语言交际的微观研究中也得到佐证，在研究言语信号和非言语信号的互相作用时发现这些作用也传达有关言语事件的情境信息，并且制约释义的选择性。许多语言学的语义学家也对权威语法学家只注意孤立的命题的所指语义或真值语义的做法提出了理论上的质疑。他们认为，语义分析的分析单位应该是作为人的行动单位的言语行为。另外一些研究语段的语言学家将研究重点放到了篇章结构和上下文联系中的语法和语义的信号作用上面，以及释义框架、释义模式在理解语段意义中的作用上面（Fillmore 1977. Schank & Abelson 1977. Spiro, Bruce & Brewer 1980）。本书中介绍的研究主要受到的是社会学家的著作的影响。这些社会学家在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1967）的批判性的著述的基础上，创造了新派的会话分析，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到了话轮等会话管理机制上体现出来的讲话人/听话人协作所需要的‘会话策略’能力上来。

尽管上述研究都十分重要，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获得关于语法、文化，以及互动常规的知识融会贯通、理论整合的地步。上述的各派会话分析专家们都只是

集中到全部的信号过程的某些部分，在涉及全交际过程的其他部分时则默认其他学派、其他学科、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和研究结果。因此，语言学家在讨论语言用法的社会规范时沿用了宏观社会学家的关于群体、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功能的观念。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在讨论互动策略时采用了理论语言学家的句子层次的语法和语义分类术语。

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的会话研究的目标，主要还是描写交际符号以及这些符号的文本模式，或者是书面作品中，或者是在转写下来的口头对话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们的组织结构。几乎所有的会话语料均采自社会和语言方面同质性很高的群体。因此，大家倾向于认为会话参与能力理所当然地存在，会话人配合默契，具有相同的释义规范。但是，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层出不穷的交际失败的事件，与日俱增的宪法和法律条文的解释方面的争执，以及社会化的教育失败的纪录，都证明上述会话条件还存在着严重问题。当代都市生活的现实交际状况与那些理想的交际条件荡然迥异。我们知道，对会话人来说，对会话过程透彻的理解是吸引和保持会话伙伴的注意力的前提。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种实验的方法来分析共有的语言和文化知识是怎样形成了会话的参与能力的。

笔者针对上述论题，重点研究了会话参与者在会话进行中的释义活动，旨在发现到底是哪些事物使当事人察觉并理解了哪些释义线索，才使得他能够适当地做出回应，有效地追求自己的交际目标。毋庸置疑，会话人的交际策略的成功运用依赖于他们的语法和文化知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仅仅依靠现存的语法理论和民族文化志来解释语境释义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分析过的那段会话。我

们可以说上文中讨论过的会话人所共有的背景知识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对办公室中的活动都很熟悉，而且现有的文化分析当中也还没有关于办公室日常活动的分析。即使存在着有关这些背景知识的详细描写，我们也要问到底是该环境中的哪些具体事物使得会话人能够获得他们所获取的信息。此外，作为办公室常规活动框架的必要组成部分，会话人甲讲话时所采用的词句乃致在说这些词句时所采取的语调重音模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假若甲用了另外一个句子，譬如“Do you intend to stay here?”（你打算在这儿呆着吗？），或者“Do you plan to go out?”（你打算出去吗？）；假若她把句子的重音从“be here”（在这儿）移到了句子开头的“are”（是）上面，乙的反应便会不同，整个的互动过程就被改变了。这些习惯表达法和句子重音，将成为我们重点讨论的对象，但一般的语法描写当中却总是忽略了这些内容。所以，对话推理解的研究需要一些与传统语法分析和民族志分析中没有采用过的操作程序和观察视角。

从某些学科的研究视角来看，对推理过程进行分析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会话所具有的连续问答的性质使我们可以避免、或者回避许多分析孤立的词句时所产生的问题。上述会话实例可以显示两项有利分析的特性：（1）听话人和讲话人实际上是在共同商榷释义，在谈话过程中的每一个判断都及时地被对方的反应所证实或者修正——判断推理的根据不局限于个别话语。（2）会话内容本身常常包含内部证据，证明参加会话的人是否真的沿循有关释义惯例，以及是否达到了交际目的。

由于会话具有上述特点，我们可以对会话进行多方面的分析。通过检查会话人是否成功地确立了共同的谈话主

题，是否保持了主题在谈话过程中的延续性，或者是否顺利地完成了话题转换等，我们可以衡量交际的质量和效果。对听说活动及其反应时间的测量，以及会话节奏和非语言反应方面的证据也都可以用来证明交际或会话合作方面的失误如果我们了解交际活动的结果，语言学的分析可以结合对会话人的事后访谈，了解当时他们是根据什么线索、利用了什么样的知识来获得了他们所获得的交际效果的。此外，通过比较具有不同结果的同类交际事件，也可以找出那些引起不同结果的交际方面的原因。

我们这里所介绍的解析性研究方法，不需要假设会话人共守某些讲话规则、共有—个评价标准。摒弃了这些有关共性的前提，我们的研究方法就切合了现代都市社会的现实交际状况。现代都市中社会界限模糊了，不同背景的人士之间的频繁交际不是罕见的特殊情况而成为普通、一般的状况，而且不同社会场合又有了不同的交际惯例，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背景和情境整齐划一的交际环境。本书介绍的许多研究项目都重点研究了由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参加的交际活动，尽管这些人讲同一语言，他们在交际过程当中却需要留意并克服许多背景知识方面的差距才能够保持他们对会话的介入程度。除此之外，我们对表现出语体转移和语码转换的交际活动也进行了分析，指出讲话人是怎样利用已知的社会背景和语法、词汇方面的差异来传达新信息的。

笔者早年曾在印度、挪威、奥地利和美国等地做语言和民族志的调查研究工作。工作中对地域和社会方言、以及双语社区、偏远小社区进行了许多田野调查。调查中发现的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引起了本人的兴趣（Gumperz 1971a）。对于群体间接触的普遍规律的关心使本人的兴趣进一步转移到都市环境中的跨民族交际活动之中。但是，

通过对会话策略的研究，使笔者进一步认识到社会文化差距及其在语言上的反映是许多误解、成见、社会偏见和歧视的根源；但还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人们在语言方面的差距不仅仅具有正面传达信息的作用，而且具有制造和保持某些社会结构中的专业分工、权势、地位、角色等之间的微妙的界限的作用。由于人们认为这些界限与价值观方面的差距有关，所以他们在关键性的人事遴选活动中往往以这些间接性的交际策略作为划界的依据。许多个人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命运，在招聘面试、职业咨询、劳资谈判、委员会评审中就这样被决定了。

由于那些朝夕相见、人人平等的小群体社会的消失，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活动中，多样化的背景知识和多样化的交际惯例成为了主要的信息处理内容。任何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只要是能够解决社会权势、社会流动、社会控制所带来的语言问题的理论，都不可能以信号系统的同一性的假设为有效通讯的前提。简单化地将交际行为一分为二地分成同质性的组内交际和多样化的组间交际，也不符合我们所处的日益变化的社会中的交际活动的现状。我们的理论必须能够容纳程度上的差别，通过对重要交际活动的深入分析，发现这些程度上的差别怎样影响个人在社会交际中的表现，以及人们是怎样传达自己的意图和交际目的的。正是在都市生活的领域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过程的内涵。通过认真检查会话人所操作的信号机制，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距离是怎样维持的，以及释义框架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展示这些交际规范是怎样与个人和群体的背景相关联的。如果对会话推理的研究可以达到上述的目标，那么它的贡献将不止于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而且会扩展到关于社会互动和社会进化的普通理论中去。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包含对现存理论的评述，加以一些具体会话段落的分析和交际实践的个案研究，用来说明有关理论。其中，第二章中首先综合评论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对语言研究的新途径的影响。然后通过对一段言语交换的仔细分析，指出现存的语言使用研究中的一些观念的局限性。第三章和第四章集中到对多语区中的语码转换现象的研究。多语社区中的语言多样性不仅仅被用来象征组别身份，而且还用来服务于特别的交际目的。第五章探讨节律在话语释义方面的作用，分析会话节律规范上的变异及其交际作用。第六章讨论语境化提示和语境化规范观念，并且回顾了关于非语言交际和会话同步性的研究方面的成果。这些研究显示出即使是一些微妙的下意识地接受的言语暗示也可能改变会话释义。通过几段会话分析，我们展示出即使是一些简短的会话的理解过程也可以与会话人的个人历史以及背景文化联系起来，从中得到解释。第七章详细讨论了当前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心理语言学对会话分析的研究途径。较为通用的会话推论的观念在此被介绍出来，并采用更多的会话分析的例子来说明。第八章是对从就业指导的咨询中节录下来的一段较长的对话的深入分析。这些分析证明即使是对英语语言没有问题的讲话人由于运用了不同的语境化规范来释义也可以造成交际失误。第九章分析了一个由于错误释义结果造成法律纠纷的公共事件。这两章的内容使我们注意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公共事物当中反复出现的许多问题。第十章作为一个简短的后记回顾了本书中应用的分析原则的理论基础并且讨论了我们的研究途径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二章 人际交际社会语言学

现代社会语言学的背景

社会语言学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学科。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人类社会群体的语言用法，所以它的研究素材和分析方法与语言学都有很多不同。但是这两个学科却有着学术上的渊源关系。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语言研究都是作为探索人类群体的文化根源的总体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的。这种研究一方面由抽象的科学的求知探索所推动，另一方面也出于那些新出现的中欧和东欧的民族政体奠定其民族意识的需要。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来证明早期的民族文化，由于没有足够的发表了的著作来记录地域语言变体，学者们开始寻求新的研究手段，意图再现德国浪漫学派所谓“*Ver-sunkenes Volksgut*”，过去时代的“被埋没的民间文化”。在文化进化史的研究中，一方面人们努力地去寻找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对没有文字的民间语言的调查。

尽管 19 世纪语言学者们的申明目标是发展出比较和构拟的语言学工具，从社会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对于作为语言交际的潜在机制的语法结构的发现。语言科学的先驱者拉斯克（Erasmus Rask）和格里姆（Jakob Grimm）已经证明，要想找出语言进化的规律性，不能依赖对个别词汇的比较，必须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找出系统性的模式。

学者们随即将注意力集中到口头语言的语音方面。他们发明和采用新的更可靠的记音方法，克服采用传统字母表记音的局限性，使语言调查者可以将他们还听不懂的被调查语言或方言的更多的发音细节记录下来。研究的目标是产生一批精确的语音文本并从中发现语音变化的普遍规律。

实验语音学的发展很快又使大家认识到即使是十分精确的发音描写和对单词的详细的语义界定也不足以确定到底什么是语言中稳定和规则的东西。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对于发音和释义也出现很多差异，不同的语境又造成更多的差异。学者们愈是注意描写这些差异的细节，他们就愈难发现语言变化的普通规则。直到学者们将研究重点从发音方面转向语音在听觉上产生的对比效果时，才发现了一组组听觉上类似的语音之间的对比关系，从而制定出了有用的概括性的规则。

语音学的研究发现，任何一个讲话人，任何一组使用同一语言的讲话人，在讲话时实际上使用的语音差别只是外来的语音学家观察到的许许多多语音差别中的很小一部分。换句话说，本族讲话人的交际常规中所包含的有意义的发音特征只是许多可以察觉的发音特征中的一小部分。在进行语法分析（包括语音系统的分析）时，那些不传达

语法或语义信息的发音特征应该予以忽略。例如，下列英语单词 *kin*, *skin*, *can*, *cool* 的黑体字母所代表的辅音可以明显地听出他们之间在发音上的区别，但是他们在英语中都被归为同一发音，用音标 /k/ 来表示。因此，对于发音的直接记录还需要进行对比性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提供语言结构系统方面的证据。

在语音和意义两个层次上将实际观察的结果与建立在对比分析上的抽象结论区别开来，这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索绪尔的理论提出了 parole（言语）与 langue（语言）的区别。言语指个别讲话人在具体环境当中说出的话语，每一次讲话和另一次讲话都不尽相同。语言却是指一个潜在的系统，该系统反映出所有个别话语中相同和稳定的东西。尽管所有有关语言的信息必须来源于言语实践，但是在现场记录的原始材料也必须经过筛选和概括才能够成为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因此，语言学家们将个别的语言内容从具体的社会交际以及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抽取出来，再根据他们的理论标准进行形式上的分类。这些语言学家的研究目标包括去除冗余信息，测试分类空缺，并最终归纳出最精练的一组相对范畴。这些以相对关系来定义的范畴，尽管不能忠实地将发音细节全部反映出来，但是却能够通过语言实现规则将有意义的发音特征都反映出来。这一点有些像化学公式，尽管它可以表示试管里的物质，但是不能更详细地描写它当时的全部特征和状况。

索绪尔的结构分析原则，最初是在音系和形态分析方面发展起来的，很快就扩展到语音研究的其他方面。近几十年来，这些原则还被应用到文学批评的研究当中（Barthes 1964, Culler 1976），以及人类学对于人的信念系

统的研究方面（Levi-Strauss 1976）。从最概括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能力可以用一系列抽象的、以相对关系来定义的、不受具体环境制约的符号范畴来描写。人们就是用这样一些对比性的范畴作为参照系统来评价和理解他人的行为，来引导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将任何知觉获得的信息归入已经确立的渠道，同时滤除任何无法归入的信息的。

对于历史语言学家来说，上述理论视角的特殊意义在于，结构分析不仅能够揭示语音变化的规律，而且能够引向一个新的层次的语法分析，这种分析可以超越地理、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变异而描写出一方人口在语言方面的共性。索绪尔以及许多与他同时代的方言学家都充分认识到了语法区别和人口界限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的意识形态却倾向于认为人类总体就是由一个个种族和民族单位所组成，而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都有自己独立的传统和文化，都有一个语法结构独特的方言或语言。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就认为，日常的具体的语言行为，虽然是派生于语法系统，却是非系统性的。他们认为这些具体的行为更多地反映了讲话人一时的偏好、怪癖或者表现手法、情绪倾向等等，并不属于传达实质性信息的通用语音信号系统的部分。

在结构语言学的研究当中，对现实中的语言行为的观测调查只不过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预备阶段，好像是进入语言学研究大门的一个台阶。只有那些从具体的语境当中抽取出来的，经过了反复筛选、反复提炼而获得的抽象的语言范畴才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学研究方法从而变得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分支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因为社会科学一般是以实践性的直接观察的结果来作为统计和分

析的材料的。

人类语言学家发展了一系列将直接观察的结果转变为语言结构的范畴的程序。在博阿兹（ Franz Boaz）萨丕尔（Edward Sapir）和布龙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的影响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到了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上面。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北美的印地安语言十分不规则，难以被讲欧洲语言的人所掌握。这些语言学者们开始脱离语文学的传统，当他们的欧洲同事们仍然在书斋里搬故纸堆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沐浴在经验主义的氛围之中了。他们进行田野工作，直接接触土著居民，在收集神话、传说等民族志材料的同时也收集纯粹用于语法分析的语料，同时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开始了解土著人的信念传统。此前关于北美土著的描述多出自探险家和传教士之手，大部分是不全面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描写。语法方面的描写更是达不到当时欧洲语言已经达到的语法研究水平。

为了克服在学习土著语言时无章可循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要改善描写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语言学家们发明了田野工作中的语料引发采集技术。应用这种技术，他们与土著讲话人合作，日复一日地采集、分析、验证语言材料。通过反复引发和分析某些有限范围的语料，语言学家们试图确认那些基本的对比形式。这些外族调查人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训练自己听察土著语音的能力，扩展自己的发音能力，通过长期实践之后，学会复制那些本族讲话人做出的语音、形式和语义方面的分别。操作程序就像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双方逐渐地学会进入对方的参照体系。

长期的知觉训练和浸入到外族认知系统之中使得相当

大一批这样工作的学者认识到这种语言学方法在更广泛的行为科学的研究领域中的作用。结构分析不再仅仅是用来进行历史语言构拟和发展无文字语言的书写系统的工具了。它已经变成一种从原始观察结果中总结规律的新方法，一种从一般的观察中提炼特殊的知觉和认知信息的发现程序。使用这些方法和程序，许多前人忽略了口头语言的特征或者观察到了却无法解释的特征现在得到了注意和解释。由于传统的语法观念作祟而认为是不规则或难以分析的语言现象，现在通过应用新方法的重新调查，都得到了解释。通过这些解释，人们认识到这些无文字的印第安语言像那些熟悉的语言一样具有语法方面的规则化和系统化特点。

从概括的角度来说，结构分析提供了人类认知受到历史因素影响的证据。学习，并不像经验主义者们宣扬的那样，仅仅是积累经验。被感知后存留在脑海里的信息是我们的文化陶冶的间接产物，因为我们感知和吸收信息的能力是文化陶冶的结果。语言人类学家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都更能理解人类社会中历史地形成的规范的作用，更能理解社会规范在决定人们思维和行动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别人看做是不开化民族的不可理喻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是存在着功能性的文化差异的证据。

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研究途径的最好演示要数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关于音位的心理现实的经典巨著(Sapir 1949)。在这篇著作中，萨丕尔报告了他怎样训练美洲印第安人来转写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他展示出，这些印第安人的转写偏误都可以根据对他们的语言的音位系统的了解而预报出来。因此，对于萨丕尔来说，结构分析法不仅仅是提取和概括原始语料的方法，它还能够用来解

释和预测那些难以直接观察到的人类行为。

萨丕尔继续著述立说，发展他的观点，并进一步推广到人类文化和人类认知方面。他的有关著作，和他的学生沃尔夫（ Benjamin Lee Whorf ）的著作，特别是那些关于印第安语的语法系统与印第安人的世界观的关系的著作，导向了一种对于语言思维的新认识，一种迄今还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一直比较流行的观点来自哲学领域，认为语言思维可以用普遍性的逻辑公式来描写，而不受命题在个别语言中的具体表达方式的限制。萨丕尔却认为意义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下意识的模式。他用来解释他的调查结果的下面这段话，与现代感知主义者如出一辙：“ 一个正常的个人在观察其他社会中的人们行为时，总是不能不把自己熟悉的形式套用到他所观察到的与自己社会中功能相似的行为上去。换句话说，人们总是有意识地找到他们在下意识地寻找的东西。”（ Sapir 1949: 10）注意，萨丕尔在这里将文化方面的区别看做是内部统一的功能系统之间的区别。尽管萨丕尔成功地展示了语音辨识能力受到下意识的限制，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从未尝试过验证他们所持有的关于民族文化的类似的观念。这些一般是受到默认的观念认为，人类总体是分作了一个个文化上内部同质而外部分明的单位。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当中甚至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文化环境是怎样陶冶了人们的认知能力，以及怎样影响了人们在日常活动中与人交往的能力。

事实上，尽管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志调查和实验性研究，但还没有人根据结构分析的原理发展出一种成熟的研究方法来调查日常互动中的感知能力的局限性。有关语言和文化的著作不乏新颖，但多属思辨之作，依据的是对个别群体的东鳞西爪的特征描写。系统性地对产生这些文

化特征的过程和条件的调查工作还没有展开。

那些继承了萨丕尔和其他早期结构主义者传统的学者现在继续致力于发展可靠有效的语料引发程序，用来调查未曾调查过的语言。他们的方法论的原则却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例如，派克（Kenneth Pike）提出的用来解释本族讲话人的感知能力的 emic（“位的区别”；“有区别意义的差异”）和 etic（“非位区别”；“没有区别性的差异”）一对概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中去了。

语言学家的目标应该是扩展我们对于人类语法模式的多样化的了解，并且将对语音方面的系统性研究推广到其他的语法内容上去。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对于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集中到历史构拟及其相关的文化历史方面的探讨上去了。随着对无文字语言的更多了解和对这些语言的语法的复杂性的进一步认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加强了对语法系统本身的研究。研究中首先受到重视的是语法规则的逻辑关系。但是，对于交际现象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

这种研究兴趣上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语言学家的方法论。研究无文字语言的学者的基本方法属于简化主义的方法，从大量的原始语料中将少数关键性的特征离析出来。在进行这种详细的对比性的研究时，直接分析正常语速的自然谈话似乎是难上加难。在没有现代录音设备的情况下，调查人需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记音，发音合作人需要一遍遍地重复。在第一个记音阶段完成之后，还需要对通过形式分析而产生的词汇和短语一个个地进行验证。调查人根据自己假设的音系系统和音节结构选定一批材料再去与发音人验证。在致力于完成结构描写的过程中，语言